

乌蒙山回旋战：集游击战和运动战之大成

□ 石 晶

1936年2月至3月，面对国民党军10个师又1个旅的尾追和侧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在贺龙、萧克的率领下利用乌蒙山区复杂的地形与敌人进行机动作战，史称乌蒙山回旋战。不仅给围追堵截之敌以沉重打击，还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是长征途中军事指挥的又一次“神来之笔”。

挺进乌蒙，重新布局

1936年2月，蒋介石调集国民党中央军、滇军、川军向红二、六军团所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进犯，意图将红军主力一举歼灭。面对敌人重兵的合围之势，红军决定暂避敌锋，撤离毕节进入乌蒙山区。纵横云贵两省的乌蒙山，是金沙江和北盘江的分水岭，地势复杂、人烟稀少、给养困难，且自然环境恶劣。红军刚一进乌蒙山，探明红军动向的蒋介石急令万耀煌、樊崧甫、郝梦龄、孙渡、李觉、郭汝栋等6个纵队追堵红二、六军团，截断了由毕节前往安顺的道路，欲将红军压迫于金沙江以东的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加以围歼。

生死存亡之际，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等前往野马川与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等会晤，召开“野马川会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兵力部署以及乌蒙山区所处的位置、气候条件，决定以乌蒙山作为屏障展开积极行动，以赫章为中心，在赫章、威宁和云南彝良、镇雄、昭通一带迂回，伺机歼

敌，以虚实结合、声东击西的战术甩掉敌人追兵，向滇东转移。会后，红二、六军团取得以则河战斗胜利后挥师镇雄，途中获悉敌纵队司令万耀煌将率领敌第13师经哲庄坝到镇雄，贺龙当机立断设伏哲庄坝，并迅速作出具体安排：决定集中两个师兵力，由贺龙、任弼时担任前线指挥，采取分段伏击战术。当晚，贺龙带领红二军团第4师和第6师兵分三路先期赶到哲庄坝准备伏击。一路由巴基的山梁子至三锅庄、坪子场；二路由巴基到哲庄坝至黄家营盘；三路由大屋基至桃园大垭口。此外，急调红6师18团对万耀煌部进行截击。

分段埋伏，主动出击

1936年3月12日9时许，当万耀煌纵队部分士兵翻过桃园大垭口时，伏击战打响了。红军从西侧制高点向敌军发起攻势，将正在行进中的敌第13师拦腰截断，将夏鼎新旅压返桃园、潘祖信旅压下哲庄坝，迫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指挥完全失灵。枪声骤响，雨落地滑，面对红军的迅速包抄，敌军乱作一团。有的弃马而逃，有的滚下山坡，背包、枪械散落一地。惊恐万分的万耀煌慌忙换上马夫衣服，混杂在溃散的敌兵之中逃窜，在桃园大庙设立了临时指挥所，命令夏鼎新旅死守桃园小垭口。被压到哲庄坝的潘祖信旅，在红6师的拦截包围之下，又被截成两段。红军以密集兵力发起猛攻，反复肉搏10余次，一部分敌人被赶进毛脚落沟，全部缴械。10时许，18团在政委余

秋里、团长成钧率领下赶到哲庄坝干沟梁子，与沿山坡自西向东开进的敌军不期而遇。他们立即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在短兵相接之后掩护主力部队转移，余秋里在战斗中英勇负伤。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毙伤敌营连以下官兵120余人，俘敌2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8挺，长短枪数百支，辐重弹药300余担，取得了乌蒙山回旋战中的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等欲将红二、六军团“聚歼于威、水线以北地区”的企图。此时，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军主力已被红军引向东西镇雄、毕节一带，西南面仅剩小部分军队，防务空虚。红二、六军团抓住战机，突然转身西进，经财神塘战斗后秘密突围，从郭汝栋与樊崧甫两纵队之间穿插过去，跳出了敌包围圈。而后继续南下，在28日抵达南北盘江流域之间。至此，历时一个月，辗转千里的乌蒙山回旋战胜利结束。

胜利会师，创造奇迹

哲庄坝战斗是乌蒙山区回旋战中的一次重要战斗，为红二、六军团最后从财神塘冲出敌军包围、继续北上长征奠定了坚实基础。此战获胜，为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谱写了光辉史篇。在乌蒙山回旋战中，面对国民党军10多万人的四面合围，只有1万多人红军几度身陷绝境，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红二、六军团在贺龙、萧克的率领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临变不惊，采取敌进我进、灵活机动的策略，巧妙地利用各军阀间的间隙与

敌人周旋，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放弃一切有利条件进行斗争，以声东击西、忽左忽右的战术迷惑、疲困和调动敌人，化被动为主动。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抓住战机，当机立断，打破了敌人“围歼”的计划。朱德后来给予了红二、六军团很高的评价。他说：“二、六军团在这次行动中，是游击战、运动战的大成……能顺利地活动于湘鄂川黔滇康等省，高度地保存有生力量，完成了预定的战略任务。”

乌蒙山回旋战是红军长征史上灵活运用兵、巧妙突围的著名战役，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有异曲同工之妙。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于10月22日抵达宁夏固原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征宣告结束。1936年11月，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同志时，高度赞扬道，“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把握认知主导作战之要

□ 汪 正

“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这一条永远不会变。”着眼对敌方心理、精神进行干扰，进而影响其思维决策、军心士气、战斗意志，力争不战或小战而屈人之兵，是作战制胜的重要原则。因此，可通过认知诱导、认知干扰、认知塑造等行动，夺取认知空间制权，摧毁敌方支撑作战的认知基础，从而达成对战争进程的全面把控。

认知诱导影响态势发展。现代作战的国际关注度和特殊复杂性，决定了通过媒体宣传、心理威慑等方式，诱导国际国内公众和特定对象的认知，可以在国际舆论、社会信心、军心意志等方面引发连锁反应，并由此影响战争全局，酿成改变内政外交时局乃至国家长期发展走势的“蝴蝶风暴”。一是广泛发声赢得理解支持。通过多边磋商、立场声明等政治、外交活动，谋求各方的共同利益，以获得周边国家、中立力量的普遍支持，最大限度减少可能遭受的国际制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密集发声，全方位宣传军事行动的正义性、合法性以及官兵坚定的战斗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同时有针对性地揭批各种不实报道和宣传，力争引导国际国内舆论，形成得道多助的主流舆情，为军事行动争取广泛的民意基础。二是警示威慑弱化抗守决心。通过提升部队战备等级、实施紧急拉动、开展针对性临战训练或联合演习，展示己方的作战能力与战斗作风；组织

高新技术装备作战实验，展示“撒手锏”武器作战性能，通过适时、适度的警示、震慑敌方，使其意识到双方军事实力差距较大，从而削弱其抵抗意志。三是渗透攻心扰乱军心士气。通过战场喊话或敌后渗透等方式，向敌方官兵阐明投诚投降的优待政策，负隅顽抗的必败后果，用利益关联打击敌方军心；结合敌方文化传统、知识背景，制作攻心宣传品，诱发其思乡厌战等情绪，用情感纽带弱化敌方士气。

认知干扰扰信增作战效能。在与敌方体系对体系的对抗中，通过对敌方指挥链、杀伤链、保障链的指控人员、操作人员、导调人员等关键节点，进行饱和式、迷惑式、欺骗式认知干扰，进而剥夺或降低敌方决策能力，可使得物理毁伤、网电攻击行动获得“四两拨千斤”的非对称收益，极大地增强多域作战效能。一是饱和式干扰扰乱敌节奏。按照一定的战术原则构造多个高仿的进攻待机地域，设置假的指挥所、阵地和武器装备，并频繁进行战场机动，构造虚假定制战场动态；利用一定的电磁频谱，定向密集发布我军的计划安排、任务部署等军情通报，构造真假难辨的情报信息，从而制造和扩散战场认知“迷雾”，使敌方尚未完成当前情况的决策处理时，即面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而使其在不断被动应对中理性混乱、无所适从。二是迷惑式干扰扰乱敌决策。利用网络爬虫、日志挖掘等技术，挖掘分析敌方关键节点上作战人员的消费数据、娱乐数据、通信数据等，剖析其兴趣爱好

好、行为习惯；利用智能化任务规划系统，迎合目标对象已有的经验记忆、思维习惯，构造实时变动的战场态势信息，使其陷入人为设计的决策环境之中，并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证据”，用来佐证其判断和认知是“正确”的，最终使其因沉溺于“认知茧房”中无法自拔，而看不到事情的全局真相，指挥决策出现偏差。三是欺骗式干扰扰乱敌部署。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发布失真的音视频或影像资料，影响敌方判断；设计“瞒天过海”“声东击西”等战术手段，并配合相应的兵力佯动、火力佯动、电磁佯动等动态，造成敌方对己方态势和意图的误判，从而按照己方设想的作战环节进行决策部署，采取有利于己方任务完成的特定行动。

认知塑造主导战法设计。在作战的战前准备、战中实施、战后维稳全程，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方式，运用媒体、网络、心战等多种手段，掌控认知空间主导权，实现对国际国内舆论的认知塑造，最终凝聚主流意见，是深刻影响战争走向的重要变量。因此，可以着眼引领各方认知走向，设计力量运用、交战方式、行动方法。一是导“向”式塑造。认知主体在进行新的认知活动之前，已经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认知习惯，可利用其习惯，因势利导塑造认知。具体来说，利用大数据技术广泛采集敌方相关数据，建立人物分析模型，分析其认知特点；运用智能生成与推送、社交媒体直播、机器人写作等智能化传播

技术，通过舆论控制、法理征服，使敌方认知倾向与己方所宣扬的观念并轨趋同，从而为己方作战行动赢得广泛支持。二是控“源”式塑造。认知活动都是基于一定的信息进行，可通过对认知主体产生认知的感知觉信息进行源头控制和设计，以干扰其理性决策，引导其认知动态。采用示形威慑、抛饵诱骗、虚假欺诈等方式，抛出警示信息、诱饵信息、虚假信息，使敌方内心忌惮、松懈斗志、判断失误；利用感知觉阈下信息刺激技术、神经系统潜意识声音操控技术等，在敌方影像资料、宣传作品中植入特定的诱导信息，潜移默化中改变其对特定问题的认知。三是断“链”式塑造。认知过程是一个一个具有前后因果关系的认知活动前后链接而成的有机整体，可着眼破坏其链路完整，使敌方认知因前后链路阻断，而无法形成认知循环，停留在局部上。具体可运用电子战和网络战等软打击方式，对敌方指控中心、网络节点等进行攻击，破坏敌方作战信息的获取、分析、传输和利用链路，或运用火力精打等硬摧毁方式，对敌方认知体系中的关键物理节点和设施进行破坏摧毁，使敌方认知循环因信息断链而无法环环相扣。



1901年11月，贺诚生于四川省三台县龙门垭村（今属射洪市）一户普通农民家庭。他一生经历过秘密工作的锻炼，革命战争的考验，为党和人民的卫生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是我国军队卫生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1958年，贺诚被授予中将军衔。

风华正茂，走曲折革命道路

1922年，贺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立医专（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在校期间，他经常阅读进步期刊，并仔细钻研了《共产党宣言》，开始坚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这个使命。1925年，贺诚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历经“三·一八”惨案后，北方革命运动处于低潮，党组织决定派贺诚到广东的北伐军担任军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贺诚因南北转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面临数不清的诱捕和陷阱，他坚决追随党前进的步伐，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医处参加了广州起义。在面见了张太雷、聂荣臻后，他们立即接管了医院，救治起义伤员。不久后，红四师在海陆丰重新恢复贺诚的党籍。正如党代表袁裕所说：“在白色恐怖下一系列转折关头，你的革命坚定性和奋斗精神，师部的同志有目共睹！”

后来贺诚几番辗转到达上海，在周恩来、陈赓领导下的党中央保卫部门，以医师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由贺诚和柯麟分别使用化名贺雨生、柯达文在上海合办达生医院，掩护中央领导人坚持秘密斗争。周恩来亲自就达生医院的任务、活动方式作出布置。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患肺病，还经常来这里治疗。后由于叛徒出卖，彭湃、杨殷被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达生医院关闭。随后，贺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华南大学、群众大学校医和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中共秘密工作。1930年初，根据上级指示，贺诚在武汉法租界开办华中大药房，以此为掩护，建立起中共中央军委在长江五省总交通站。从各地来的同志通过这里与中共中央军委接通关系，许多党内文件通过这里秘密传递，药房还负责为红军筹办药品、器材。同年10月，因叛徒出卖，五省总交通站遭敌破坏，贺诚机智逃脱，重返上海。

历尽艰辛，创红色卫生事业

1931年初，受中共中央派遣，贺诚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军医处处长、红军总医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当时中央苏区因连年战乱，伤病员多，加之赣南、闽西等地卫生条件差，疫病流行，卫生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为迅速有效打开工作局面，他对红军医院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的卫生工作方针比以前抓得细抓得实，而且更具科学性和可行性。如针对红军中易发的疟疾、痢疾、疥疮和下肢溃疡这“四大疾病”，他明确提出了“预防第一”的方针；为切实贯彻落实古田会议精神，纠正部队医疗工作中存在的军阀思想和官僚作风，减轻伤病员的痛苦迅速恢复健康，他明确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原则；为大力加强医院管理，规范医院工作流程，提高医院治愈率和出院率，他从建章立制着手，主持制定了针对医院规范管理的《卫生法规》。

1931年，连续粉碎三次“围剿”后，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为帮助卫生人员提高思想觉悟，促进提升业务水平，教育并引导苏区群众防病治病，贺诚创办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份卫生专业报纸《健康报》。同年，为尽快改变部队卫生人员严重缺乏的局面，他向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军自己的军医学校、卫生材料厂，得到了毛泽东赞成。1932年2月，红军第一所军医学校在于都县城正式开学，贺诚担任校长。毛泽东为学校作了“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题词，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领导人出席开学典礼。1932年秋，红军总医院处改为总卫生部，贺诚任部长。由于敌人的“围剿”和严密封锁，苏区的药品、食盐、粮食奇缺。贺诚筹建

贺诚将军：我军卫生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

□ 张立哲 佟亚楠

了红军第一个卫生材料厂，生产出了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特别是创造性地把粉针剂改良为片剂型的中药，更为部队所欢迎。卫生材料厂解决了红军创建以来严重缺药的问题，意义非凡。

辗转征战，担军事卫生使命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贺诚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长征路上困难重重，很多时候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部队都要忍痛扔掉辎重。但贺诚作为医生，一直舍不得丢掉红军初期的第一台X光机，王稼祥、陈毅等都靠它救过命。遵义会议后，红军决定调整战略，轻装快进。贺诚还是舍不得扔掉X光机。毛泽东知道后，亲自找来贺诚，和他进行谈话。最终，贺诚想通了，第二天派人把这台称为“照病机”的宝贝藏到了一个贫苦农家。1937年6月，贺诚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以医生的身份护送王稼祥前去苏联治病，后留在苏联进修学习。他先后就读于苏共中央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共产国际远东局党校和莫斯科中央医师进修学院。1941年9月，贺诚取道乌兰巴托回国，因边境被敌封锁滞留在蒙古从事医务工作，直到1945年9月才回到张家口。

回国后，中共中央指示贺诚前往东北，先后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和政治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卫生部部长、政治委员。他从加强政治工作、建立伤病管理委员会入手开展工作，建立起一套学习制度、生活制度、评比制度。他深入贯彻“一切为了伤病员”“一切为了恢复健康上前线”口号，着重加强自身建设，改进医院工作。同时，他为破解医院技术水平低的问题，决定在全体工作人员中掀起新疗法、新技术的热潮。这一系列政策实施后，伤病员中开展了“前方当英雄，后方立新功”活动，医院工作人员中也掀起了创造优异工作成绩的立功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军队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倾注着贺诚的智慧和心血。不论是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医疗卫生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还是在长征中、解放战争时期协助前方部署伤病员收容工作，他都为军队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